

刊名创意:王蒙 刊名题写:沈鹏

本刊主编:姜锦铭

值班责编:李牧鸣 刘小草

邮箱:worthreading01@163.com 电话:(010) 88051377

78 年前在侵华日军一次大扫荡中,40 多名新华社新闻战士壮烈捐躯。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上镌刻了这样一段历史:有人以笔为枪不幸中弹、有人临危不惧纵身跳崖……

本报记者赵东辉、王菲菲、王学涛

1942 年 6 月 2 日,这天是黄君珏 30 岁的生日。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,她抱着“宁死不当俘虏”的决心,纵身一跃,跳下万丈悬崖,与出生仅 3 个多月的儿子永别。

太行山壁立千仞,清漳水缓缓流淌。山西左权麻田西山上,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上镌刻了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:有人以笔为枪不幸中弹、有人临危不惧纵身跳崖……在 1942 年日本侵略者发起的“五大扫荡”中,40 多名新华社新闻工作者壮烈牺牲,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。

#### 寻找“战地黄花”

深秋的太行山,金黄色落叶铺满山坡。

11 月 3 日,记者一行向太行山深处的庄子岭“道士帽”山挺进。

一个老乡带队爬山,大家踩在落叶上一步三滑,稍不留神便会摔倒,必须时时抓着树干,宛如猴子攀树。满眼的荆棘灌木从一会儿扎到手,一会儿又钩住衣服。没人想说话,只有“呼哧呼哧”的喘气声萦绕耳边。

终于到达山顶,记者缓缓直起腰,东找西瞧不见山洞。夕阳正在西下,不得不下山。记者返回左权县城已是晚上 9 点多。

11 月 4 日 7 点半,记者再次踏上寻访路。

这次 3 个老乡带路,换路而行。路程明显缩短,但却十分陡峭。有的石阶仅容一只脚,两只手也只能扒着峭壁,而身后就是悬崖。攀爬一个多小时后,一个山洞映入眼帘。

站在洞口,记者心潮澎湃,这里就是新华社华北总分社、《新华日报》(华北版)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烈士的跳崖处。

山洞并不大,有两三平方米,前面是一条很窄的小路,上面是峭壁,下面为悬崖。由于道路陡峭,附近又有十余个山洞,长期以来黄君珏到底从哪里跳崖不能确定。记者花了两天时间,从早找到晚,中途没吃饭、没喝水,最终根据多条线索,确定了这个山洞。

与黄君珏一起藏身此洞的还有两名女同事,她们不幸被凶残的敌人用刺刀挑杀,其中译电员王健牺牲时年仅 16 岁。

当地老乡说山洞下面的半山腰处曾临时安葬过她们的遗体。“俺爹还帮忙埋呢,老百姓边埋边哭。”75 岁的欢峪沟村村民武郭锁心里一阵发痛,流下热泪。

离山洞最近的人烟便是“八路军母亲”李才清的故居。屋内老物件、老照片、奖状、碑刻等无声诉说着这位太行女杰对八路军的恩情。李才清老人去世后,她的孙辈、重孙辈仍有人在这里生活。

64 岁的郭怀生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,回忆起奶奶讲给他的往事:1942 年侵华日军发动残酷的“五大扫荡”,对太行根据地进行“铁壁合围”。他们在庄子岭一带的山顶上“安营扎寨”十余天,搜查八路军……

时光仿佛回到 78 年前。

在敌人扫荡下,为缩小目标,减少牺牲,新华社人员化整为零分散隐蔽。黄君珏带领韩医生、电务科译电员王健等曾经过李才清家,但她看到这里伤员较多,不想给老大娘添麻烦。6 月 2 日,她们沿着记者寻访的路,隐蔽在了这个山洞中。

“我奶奶拦她呢,但她看到这里伤员多,不想添麻烦,就走了。”郭怀生说。

然而不幸的是,黄君珏三人藏身的山洞被侵华日军发现,他们爬上山顶,用绳子将柴草吊下来,火烧烟熏。在敌人步步紧逼下,黄君珏向日军开枪后,纵身跳下山崖。这是她 30 岁生日晚。

黄君珏的丈夫王默磬在给岳父黄友郢的信中,诉说了妻子英勇牺牲的情况和他强忍伤痛、悲痛寻找妻子遗体的情景:

夜九时,敌暂退,她勉力裹伤蛇行,潜入敌围,爬行至该山,时皓月正明,寻到遗体,未血无伤,服装整齐,眉头稍锁,侧卧若熟睡,然已心胸不温矣。其时她不知悲伤,不感创痛,跌坐呆凝,与君珏双手相握,不知所往,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,渐握渐紧,至不可脱!迨山后枪声再起,始被惊觉,时正午夜,负遗体至适当地点,以手掘土,暂行掩埋。

“得知三人牺牲后,奶奶挺后悔,觉得当时没有拦住她们、保护好她们。”郭怀生说。

白天,侵华日军常闯进李才清家问话,但她听不懂也不吭声。鬼子见问不出东西,一脚把她踹在地上,由于石头房点不着,临走时还气急败坏地点燃家里的那一堆柴火。晚上日军不出来时,李才清用

# 中国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

记者节前夕,追忆新华社太行烈士



▲新华社职工黄君珏烈士资料照片。  
▶11月5日拍摄的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。  
▼11月4日拍摄的新华社职工黄君珏烈士藏身的山洞。  
本报记者曹阳摄



几天前,他们接到消息,日军又要来“扫荡”。《新华日报》(华北版)社长兼总编辑、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何云组织大家埋藏机器和各种物资,两昼夜完成了坚壁清野的任务,同时疏散妇孺病号,进入临战状态。

日军的“扫荡”,他们此前已经历过多次。

1940 年 8 月下旬开始,为期三个多月的“百团大战”,八路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。太行根据地成为华北抗战的桥头堡,辽县因是八路军总部、一二九师师部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驻地,成为华北抗日的指挥中心。但同时,这里也成为日军的“眼中钉”。

面对敌人疯狂围剿,何云带领报社同志辗转周旋。27 日下午,何云召集大家开会决定化整为零,分头行动突围。报社分了三小队,何云带领编辑、报务员等 10 人准备找大部队坚持出报,副总编陈克寒带着 10 名记者向太行山以南突困并随军采访,编委史纪言带领刘江、房秉玉等 60 人就地打游击。

最终,陈克寒一路顺利突围出去,而何云这路却遭遇敌军。

从 5 月下旬开始,日军从同蒲、正太、平汉等铁路沿线据点,纠集了两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以及大批伪军共 3 万多兵力,并出动飞机多架配合轮番轰炸,先向太行山北侧,后向太行山南侧地区,进行所谓“铁壁合围”。

“敌人非常狡猾,如果遇到主力部队,则聚而歼之,如果是后方党政机关,则将其部队散作扇形,如同梳头似地反反复搜索,名之曰‘梳梳扫荡’。”刘江说。

面对敌人疯狂围剿,何云带领报社同志辗转周旋。27 日下午,何云召集大家开会决定化整为零,分头行动突围。报社分了三小队,何云带领编辑、报务员等 10 人准备找大部队坚持出报,副总编陈克寒带着 10 名记者向太行山以南突困并随军采访,编委史纪言带领刘江、房秉玉等 60 人就地打游击。

在翻越乱石断崖的陡坡时,同志们担心他的身体经受不住,提议给他派两个同志专门随从他走,但他坚决不同意,操着浙江口音说,“那我不仅成了同志们的累赘,而且还变成了‘山大王’。”最后,他只同意让警卫员王保林一人跟着。

28 日黎明,敌人又开始搜山。何云带领几位同志正在大羊角附近的山坡上掩藏,不幸被敌人发现。“不要把子弹打光,留下最后两颗,一颗打我,一颗打你自己,我们绝不能活着当俘虏。”面对敌人的疯狂射击,他沉着地对身边同志说。

这时,一颗子弹射来,何云被击中,身负重伤。当医护人员前来抢救时,他已奄奄一息。但他睁开无力的眼睛,对医生说,我的伤不重,快去抢救倒在那边的同志吧。

当医护人员返回来时,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。那年,何云 38 岁。

半个月后,吴青才闻得噩耗。悲痛之余,耳畔似乎听到丈夫温和而深沉的声音:“你要坚强些!在斗争中,同时也需要必要的忍受,忍受也是斗争性的一种表现。”

何云牺牲后,刘伯承将军曾悲痛地说:“实在可惜啊!一武(左权)一文(何云),两员大将,为国捐躯了。”

杨尚昆同志在 1942 年 9 月 4 日《新华日报》(华北版)上发表的《悼何云》一文中说:接着左权同志殉国哀讯传来的,是何云同志在太行山上反“扫荡”战争中牺牲的哀讯,一个人的生死固不足可惜,何况死在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战的疆场上,这是何等光荣啊。然而何云正在壮年,党所给予的任务尚未待竭力完成,今竟不幸牺牲,这确是一个损失!

日军的“扫荡”还在进行。在敌人严密包围、反复搜山的险境中,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同志们集合了被冲散、冲散了又集合,组成了众多不固定的战斗小组,每个小组三到五人。大多数同志三天吃不到一顿饭,喝不到一点水。有些同志口干唇裂,舌头粘在嘴里,话都说不清了。

作为校对员的刘江和何云接触较多。“每天晚上 9 点钟,我拿着报纸大样去给何云看。他看得很仔细,大概 40 多分钟后,就拿红笔改出来了。”刘江说,何云很严肃,却不轻易批评人,大家都很尊敬他。

1941 年 12 月,太行山上举行了一场简朴的婚礼。何云穿一身军装,瘦削的身材;吴青是八路军总部的秘书,也是一身褪色的军装。

作为校对员的刘江和何云接触较多。“每天晚上 9 点钟,我拿着报纸大样去给何云看。他看得很仔细,大概 40 多分钟后,就拿红笔改出来了。”刘江说,何云很严肃,却不轻易批评人,大家都很尊敬他。

1941 年 12 月,太行山上举行了一场简朴的婚礼。何云穿一身军装,瘦削的身材;吴青是八路军总部的秘书,也是一身褪色的军装。

1941 年 12 月,太行山上举行了一场简朴的婚礼。何云穿一身军装,瘦削的身材;吴青是八路军总部的秘书,也是一身褪色的军装。

~中国人的喜酒~

今世缘

特约刊登



后回家。

走进一户农家,一位 50 多岁的老大娘正在烧火做饭。看到他们进来,也不惊慌,伸手就从炕上的口袋里盛了一大碗炒面。“来,把衣服换了好行动。”大娘看他们穿着八路军的衣服,麻利地从一口大瓮里抓出些破旧衣服。

在大娘家的第二天晚上,有人回来,说山那边有个新华社记者挂彩了,两天两夜没吃饭,现在还在山梁上挂着。

于是,刘江他们赶紧拿出梯子当担架,在大娘三儿子的带领下到了北山。到了一看,受伤的原来是史纪言,他正赤身面向背阴土坎,微微张口,呼吸土层上的一点湿气,以减轻唇裂舌焦的痛苦。他的左腿受了重伤,黑色的血痂,在月光下看得十分清楚。

“大伙一看那情景,都掉眼泪了。”再一次回忆当初,记者眼前的这位百岁老人又一次潸然泪下。

“你们害怕过吗?”在采访刘江、房秉玉等人时,记者曾这样问道。“我们都是自愿来参加革命的,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了。”他们这样说。

从 25 日始及以后几天内,40 多位新闻战士永远地留在了太行山上。

1942 年 5 月 28 日,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在麻田西山举行揭幕仪式。人们簇拥在纪念碑的周围,向长眠于此的英烈们默默致哀。纪念碑上,密密麻麻刻满了这些英烈的名字。

他们中最小的魏文天是《新华日报》(华北版)勤务员,只有 13 岁;年龄最大的炊事员牟忠衡,50 岁。青年诗人高咏,曾发表过《随粮带征》《春天》等长篇小说,年仅 22 岁;负责印刷工作的董自托,曾与王亚平、臧家等同志共同创办党的秘密刊物,年仅 32 岁……

同黄君珏藏身于同一个山洞中的王健只有 16 岁。

“我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办公,我是服务员,她是译电员。”房秉玉还记得,准备突围的当天晚上,他还曾去找过王健,问她要不要和他一起走。但王健说,她要照顾刚生产完才 3 个月的黄君珏,要和她在一起。

王健是河南修武县方庄孙窑村人。她 12 岁就离开河南,随军北上山西。1940 年,她被调到《新华日报》(华北版)电务科做译电员。报社、分社的许多新闻稿都是由她译发延安新华社的。

那天之后,天人永隔。王健被敌人残忍杀害。

20 世纪 80 年代,房秉玉还曾去王健的老家河南,找到了她的姐姐。当时,她的母亲已经去世。王健的姐姐告诉他,母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将妹妹的遗体找到。

为此,房秉玉又回到左权、涉县多方寻找,但却未果。这也成为他一生的遗憾。

这一大批新闻战士,大都是二十来岁的热血青年。他们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,向往着明天的新中国。但在这一次反“扫荡”战斗中,40 多位鲜活的“新闻人”牺牲,他们用鲜血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。

“2450 5478 4357 就是新华社”

“滴滴答,滴滴滴答……”辽县庄村一农家四合院内,19 岁的房秉玉正在接收延安新华社的电报。

“2450 5478 4357 就是新华社,0554 0079 7193 是北京电。”已经过去 70 多年了,这一串电码仍让他仍然熟记于心。

而当初的那个小院落,如今人去院空,土坯墙有些倾斜。记者看到,院门上黑色的木门板和别家有些不同,有两个方洞。村支书曹付才说,这块木板可能是当时的某种印刷机器的一部分。他曾见有来这里寻访的老者,手抚摸着门板,老泪纵横。

曹付才告诉记者,这个院子地下是空的,有两处入口可通往地下,一处在院落一角、一处在驴圈里,应该是当时新华社人员转移机器的地方。如今,入口处已堆满了各种杂物,无从下去。

1938 年秋季,党中央决定在晋东南创办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——《新华日报》(华北版),从而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,开辟一块紧密配合军事斗争的新闻阵地。12 月,何云率领原《中国人报》的部分人员,以及他刚从西安带来的几位新闻工作者和十几个印刷工人,带着一台铅印机,着手筹备《新华日报》(华北版)的创刊工作。

1939 年元旦,《新华日报》(华北版)创刊号出版,何云被任命为社长兼总编辑。在创刊词中,他鲜明提出,本报“成为全国各抗日党派,各抗日团体,各爱国同胞之共同喉舌”,是“鼓励前进的号角”,“愿做华北文化抗日统一战线之倡导者与组织者”。

(下转 14 版)